

中国文史考（二）

何云昭 主编

目 录

千秋文苑（续）	1
庄周与著作《庄子》	1
《周礼》的成书	3
《神农本草经》成书年代	6
《诗序》与子夏	9
《难经》的作者	11
萧何制定《九章律》	14
班昭续《汉书》	17
《刘子》的作者	20
《黄帝内经》成书年代	22
《夏小正》编撰年代	25
《史记》撰论年代	28
《报任安书》的写作年代	31
《山海经》	35
诸子起源	38
中国最早的报纸	40
《陌上桑》中的罗敷	44
孟姜女长城哭夫	47
《天仙配》中的董永	50
盘古神话	53
龙的传说	56
歌谣产生的说法	59
马王堆 1 号汉墓帛画	62
佛教传入中国	65
《越绝书》的渊源来历	68
《水经》的作者	72
《管子》的作者	75

《西京杂记》	78
《文子》真伪	83
《山海经》景物地域考证	85
《史记》遗篇	88
地方志书起源	91
王母娘娘的形象	94
杭州西湖的形成年代	97
《水经注》中水道数目	100
中国地图发展历史	103
财神爷的传说	106
鬼的传说	108
中国最早的“类书”	112
古代名士爱啸	114
佛学《大乘起信论》翻译者	117
普贤菩萨到峨眉时间考证	120
《齐民要术》的成书年代	123
颜之推纂定《颜氏家训》	126
《穆天子传》	128
《文心雕龙》中的风骨	132

千秋文苑（续）

庄周与著作《庄子》

庄周，字子休，是先秦时期道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庄周对传统和现实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追求个人自由的精神境界，对一些哲学问题发表了独特的见解，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有特色的哲人。庄周的思想材料保存在《庄子》一书中，《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传世的《庄子》有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关于《庄子》书中内、外、杂篇的异同、各篇的真伪，前人论述甚多，举要如下：

苏轼开始怀疑《盗跖》、《渔父》、《说剑》、《让王》四篇为伪作。（《庄子祠堂记》）黄震说：“庄子生于战国，六经之名始于汉，而《庄子》之书称‘六经’，意《庄子》之书亦未必尽出于庄子。”（《黄氏日抄》）明代焦 说：“《内篇》断非庄生不能作，《外篇》、《杂篇》则后人窜入者多。”

（《焦氏笔乘》）王夫之说：“《外篇》非庄子之书，盖为庄子之学者，欲引而申之，而见之弗逮，求肖不能也。以《内篇》参观之，则灼然辨矣。……《内篇》虽与老子相近，而别为一宗，……《外篇》则但为老子作训诂，而不能操化理于玄微。”《杂篇》言虽不纯，而微至之语，较能发明《内篇》未发之旨。（《庄子解》）王夫之指出了内、外、杂篇思想内容的异同，以《内篇》意义连属，指归简约，无所沾滞为理由，证明《内篇》为庄子所著。

总的来看，传统的说法认为《内篇》为庄子自著，或代表了庄子的思想。

60年代初，围绕庄周与《庄子》一书的关系问题展开了讨论。任继愈认为《内篇》不代表庄周思想，而是汉初后期庄学的作品。因此，分析庄子的哲学，应以《盗跖》、《马蹄》、《月去篋》、《庚桑楚》、《渔父》等篇为主，任继愈的根据主要是司马迁见到的《庄子》。司马迁说庄周“作《渔父》、《盗跖》、《月去篋》以诋訾孔子之徒”。（《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任继愈认为司马迁肯定了这些篇是庄周所著，这些篇都不在《内篇》，那么，和这些篇在思想上有极大差异的《内篇》就不应记在庄子的名下。战国时期唯物主义哲学家荀子评论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任继愈认为荀子肯定了庄周的自然观，荀子所指出的庄周具有自然观的篇章是《天道》、《天地》、《天运》等篇，这些篇也不在《内篇》。另外，任继愈还分析了《庄子》一书的文体、《内篇》的思想特征等，认为《内篇》是汉初的作品。

张德钧反对任继愈的观点，认为《内篇》不是汉人的著作，确实代表了庄子的思想。他对任继愈的论据逐条进行反驳。例如，上面提到的《史记》中有关庄子的材料，张德钧认为，司马迁说庄子“著书十余万言”，是认为全部《庄子》都是庄周的作品，所谓作《渔父》等，不过是举例而已，不能由此推出司马迁只肯定这几篇是庄周的著作。

冯友兰认为研究庄子哲学应该打破内、外、杂篇的成见，以《逍遥游》、《齐物论》为主，其他篇中有跟这两篇精神相合的也可以引用。

近来，张恒寿更细致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他认为《逍

逍遥》、《齐物论》、《大宗师》、《达生》四篇中的大部分章节是庄子的典型作品。

在讨论中，大多数学者把《庄子·天下》篇所述庄子思想、文风作为确定庄子著作的根据。（任继愈反对这一观点，但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天下》篇虽不是庄周自著，但还是道家者流的著作，它评述庄周的思想特点是“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庄周文风的特点是“谬悠”、“恣纵”、“瑰玮”、“俶诡”，这些特点，正是《庄子·内篇》所表现的特点。所以，以《内篇》为庄周自著的观点，还是有一定根据的。当然肯定《内篇》是庄子的著作，并不是说《内篇》没有孱杂的部分，也不能说《外篇》、《杂篇》没有庄子著作的片断，先秦哲学家的著作多经过后人的整理，弟子在整理老师著作时附加几段，是常有的事情。

《周礼》的成书

《周礼》这本古书共有 4.5 万余字。它以记述各种官职的形式来阐明制度，所以历来又称作《周官》。这本书中的官职，用天、地和四时划分为 6 个部门。在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 6 个部门中，各有首长和下属官吏数十人，构成一个严密的官僚体制。据说这本古书在汉代发现时，就缺掉“冬官”这一部分，于是就用一本类似的书《考工记》补上，成为现在这个样子。那末，这本书究竟成于什么时代？出于何人之手？历来说法非常分歧。这里我们简略介绍并分析于下：

（一）西周周公所作。汉代刘歆宣传《周礼》是“周

公致太平之迹”，后来学者如郑玄等多信之。《隋书·经籍志》称：《周礼》是“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但是这种说法可疑的地方很多。先从文体上来看，春秋以前不会出现如此洋洋洒洒，详密而有组织的巨制；再从官职名称来看，郭沫若曾作《周官质疑》，把西周铜器铭文中的官职和《周礼》比较，发现很多矛盾；三从田制来看，《诗经》、《孟子》、《礼记·王制》中都说西周有“公田”，而《周礼》中根本没有；四从封国面积来看，《周礼》说“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显然太大，与周初情况不合；此外，《周礼》中常见“祀五帝”、“掌五刑之法”，这都应是战国中期五行学说兴起后的说法。

（二）西汉末刘歆伪造。从汉代出现此书开始，到清代的康有为等，许多学者认为，《周礼》是刘歆在王莽篡位当国师时，为了配合王莽的政变而处心积虑地伪造出来的。《汉书·王莽传》云：“摄皇帝（指王莽）遂开秘府，……发得《周礼》。”可见这是王莽当政时代产物。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如宋代陈振孙认为：“此书多古文奇字”（《直斋书录解題》），其他名物度数，也可与周制相参证，应该是先秦古籍。

（三）战国策士的建国方略，或说是战国法家谋求统一，富国强兵之书。《周礼》每一部分的开头都这样写道：“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可见这是一部建国方略。战国时的游说之士，一定要有伟大的治国计划，方能打动诸侯国君，获取高位。《周礼》要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国内分布着许多大小不等的诸侯，实行中央集权。《周礼·天官·大宰》云：“以八柄诏王驭群臣。”这就是说，国王可以用爵、禄、诛、夺等八种手段来操纵群臣的行动。《周礼》中又详细讲述

了军队的编制、赋税的征收，特别讲到要用刑法来控制人民。《周礼·地官·族师》中说：“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使之相保相受”；《秋官》中又说：每年正月，“布刑于邦国都鄙”，“禁庶民之乱暴力正者”。这和商鞅的变法措施甚为接近。

（四）战国时齐国人所作的记述现实的书。《周礼》和齐国的文献《管子》有密切的关系。《周礼》云：“五家为比，十家为联”《管子·立政》也说：“十家为什，五家为伍”；《管子·禁藏》又说：“辅之以什，司之以伍。”《管子》有“相壤定籍”之法，《周礼》也有“乡遂分上、中、下授田”之制。《周礼·大司寇》说：“禁民讼，入束矢于朝，然后听之。”这又是齐国规定的“足甲兵”的法令，见于《国语·齐语》。齐国是在东夷少数民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封建国家，一直保存着氏族公社组织和奴隶制的残余。这些在《周礼》一书中都有充分的反映。

（五）战国时儒家所编的经典。它是以西周、春秋的制度为基础，经过整齐划一，加以系统化和理想化而编成的。《周礼》中记述农民有自己的份地，有比较完备的水利系统，但他们一无耕牛，二无铁器，生产工具是很原始的。《周礼》中记述的军队编制：“王六军，大国三军”，也与《左传·襄公十四年》所记的西周、春秋时的军制：“周为六军，诸侯之大者三军”相当。从思想倾向来看。《周礼》中有浓重的儒家思想。《天官》中明言：“儒以道得民”；《地官》中又讲要以“六德”、“六教”万民。当然，法家思想也有相当多的影响。所以有人认为，它的作者是接近法家的儒家，或许是荀卿弟子所编。

（六）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西汉末公布时又经过窜改。因此，其中有不少互相抵牾的地方，彼此缺乏照

顾，没有精密计算。如《遂人》中说“十夫有沟”，“百夫有洫”，是十进位制；而《小司徒》却说“九夫为井，四井为邑”。这计量是互相矛盾的？书中还有上帝高于五帝的说法，南北郊祀之制，三皇五帝的史统，这些都是西汉时代热烈讨论的问题。

《周礼》成书于什么时代，作者是谁，它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约可举出上述六种说法。究竟哪一种说法为近似，读者宜细心鉴别，反复思考而慎择之。

《神农本草经》成书年代

在卷帙浩繁的中国古代医学文献中，《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此书又简称为《本经》或《本草经》，全书分为三卷（亦有分为四卷的），共收集各类药物 365 种，其中植物药 252 种，动物药 67 种，矿物药 46 种。书中根据药物性能的异同，分为上、中、下三品。“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一般说来，都是补养类药物，大多毒性小或无毒；“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都是补养类药物，大多毒性小或无毒；“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大多是除寒热、破积聚的药物，其中有毒的居多。

这部在中国医药学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专著，关于它的成书年代以及作者问题，自古以来有着种种不同的说法。

查一下有关史料，我们可以知道此书在《汉书·艺文志》中没有著录，只是在梁代阮孝绪的《七录》和《隋

书·经籍志》中才开始记载，但均没有写作年代和作者姓名，因此历代学者对此作了许多研究和推断：

一、神农氏说。东汉郑玄在《〈周礼〉郑注》中认为此书是神农氏时代的作品，由神农氏所作。二、黄帝说。晋代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曰：“黄帝使岐伯尝味本草，定《本草经》，造医方以疗众疾”。认为成于黄帝时代，由黄帝所作。但据考古研究认为：神农、黄帝时代尚无文字。因此以上两说不能凭信。三、汉代说。梁代陶弘景根据书中所载药物产地，首先提出了此书为汉人所撰的观点。他在《本草经集注·序》中说：“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经，所出郡县，乃后汉时制，疑仲景、元化（即华佗）等所记。”又说：“本草时月，皆在建寅岁首，则从汉太初后所记也。”陶氏认为书中所记药物产地，多为东汉时所设，据此推断此书成于东汉，而作者可能是当时名医张仲景或华佗。他还依据采药时月以建寅为岁首的特点，认为此书不早于西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四、东汉至宋齐之间说。近人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说：“此书在东汉三国间，盖已有之；至宋齐间则已成立规模矣……著者之年代则不出东汉末迄宋齐之间。”又说：“……是今本《本草》与华佗、吴普有密切的关系，或即以《吴普本草》为基础，亦有其可能性也。”认为《神农本草经》成于东汉至宋齐之间，作者可能是华佗及其弟子吴普。

当今学术界对于上述问题的争论也未超出前面四说的范围。有的学者认为：《神农本草经》一书，并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笔，大约是秦汉以来许多医药学家不断加以搜集，直到东汉时期才最后加工整理成书的。持这一观点的有甄志亚主编的《中国医学史》。也有学者认为：

《神农本草经》不是成书于汉代，更非成书于汉代之前，而是梁代陶弘景才使之最后成书的。陈景河在《〈神农本草经〉成书时间新议》一文中就这样认为。其根据是：一、此书书名首由陶氏确立。《神农本草经》不见于《汉书》，而始见于《七录》，这是因为直到陶氏手中，书名才最后确立，“以朱书神农，墨书别录，进上梁武帝”。

（李时珍语）所以《七录》中乃得而见之。二、此书内容亦由陶氏而得以固定。在陶氏之前，此书的内容，屡遭前代医家比更复损益，而增减不定。陶氏为了避免类似之事的再度发生，选定了别有含义的“三百六十五”这个数字，来固定此书的内容。还有学者认为，《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时期，而作者是华佗及其弟子。如何爱华在《华佗与〈神农本草经〉》一文中就持这一观点。其理由有：其一，离此书著作年代不远的陶弘景，除了提供“疑仲景、元化等所记”的线索之外，还曾指出：《本草经》的发展和编辑，“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等，更复损益……，且所主治，互有多少，医家不能备见”。这说明在华佗之后，陶氏之前，对药物学有所研究、有所发展的人，恰恰是华佗的弟子。陶氏之语，是针对《神农本草经》问世之后的状况而发的，对探讨此书的著者，不失为一个有力的佐证；其二，从清代孙星衍、孙冯翼二人在《名医别录》、《大观本草》、《太平御览》等书中辑佚整理的今本《神农本草经》来看，其中有吴普注文189条，《吴普本草》内容12条，李当之辨药性寒温44条；其三，针对此书中存在着不少吴普、李当之论药的资料这一状况，前人《如梁后超等》就曾认为此书的作者可能是华佗及其弟子；其四，华佗、吴普等人洞晓养生之术，具有方士色彩，而《神农本草经》一书的特点，

又恰恰带有浓厚的方士气息，这也可以说明华佗与此书的密切关系。

《诗序》与子夏

凡是读过《诗经》的人都知道有《诗序》，《诗序》原来分置各篇之首，说明各篇作者、本事及作诗的意图，首篇《关雎》之序特别长，故《诗序》又有“大序”、“小序”之分。“大序”总论全部《诗经》，“小序”则分述各诗具体情况。关于《诗序》作者，异说甚多，向来没有明确结论。以时代先后而言，东汉郑玄《诗谱》猜测“大序”由子夏作，“小序”由子夏与毛公合作。子夏者，春秋末年晋国人，卜氏，名商，孔门“文学”科的优等生，晚年居西河教授，传授《春秋》、《仪礼》、《论语》、《易》等儒家经典，说他序过《诗》，虽为疑似之辞，亦实为汉儒通说。毛公史有二人，且都与《诗经》有缘。大毛公名亨，西汉鲁人，一说河间（今河北献县）人，据称其诗学传自子夏，作《毛诗故训传》，为“毛诗”的开山祖，已收入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郑玄说大毛公将诗学传给小毛公，小毛公名萇，西汉赵人，曾任河间献王博士，由于《汉书》只说毛公而不载名字，后人就难以断定《汉书》所载之毛公究竟是谁。

尽管如此，郑玄的猜测仍然得到《昭明文选》和梁代五经博士沈重以及魏晋以来许多学者的赞同。当然，反对者也多。三国人王肃《孔子家语注》最早提出怀疑，他认为子夏所序诗，即今毛公诗序；成伯王与说子夏惟裁初句，以下皆出毛公；韩愈更明确地指出，子夏不曾序诗。

范晔《后汉书·儒林传》撇开郑、王诸说，另外提出卫宏受学谢曼卿作《诗序》的新疑主张，范晔说：“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卫宏字敬仲，东汉东海人，光武时大学者，任议郎，说他作《诗序》，并非不够资格。蒋伯潜《十三经概论》就坚信“《诗序》为卫宏民作，信而有征”。

范晔的说法，新则新矣，但毕竟缺少更多的依据，而且前人早有怀疑。《隋书·经籍志》感到这个说法不甚可靠，就采取折衷的办法，认为《诗序》为子夏所创，毛公、卫宏加以润色。

唐中期以后，经学的发展出现新的动向，到两宋，完成了由经学到理学的过渡，实际上这是一次“经学更新运动”。这个运动发生的原因，除佛老的冲击，使儒学的信仰发生危机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如宋神宗向王安石所指出的那样：“经术，今人人乘异，何以一道德？”（《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九）经术的歧义，引起人们怀疑，因此，几乎对每一部儒家经典都重新检讨，疑窦颇多的《诗序》自然归为被怀疑之列。

自韩愈否定了子夏的《诗序》著作权之后，王安石主张《诗序》为诗人所自创，与圣人贤者无涉。程颐虽在许多方面对儒家经典大胆怀疑，但在《诗序》作者问题上却颇为保守，他认为“小序”为国史之旧文，“大序”为孔子所作。虽说他的观点保守，但也有一些人赞同，如同时代的王得臣就说《诗序》首句为孔子所题。

将《诗序》攀附孔子，显然有悖于史实。北宋曹粹中指出，《毛传》初行，尚未有序，其后门人相互传授，各记其师说始成序。

曹的说法，在南宋更有发展。郑樵、王质倡之，朱

熹和之，皆以为《诗序》为“村野妄人所作”。郑樵著《诗辨妄》，力诋《诗序》，明谓《诗序》实不足信。朱熹《朱子语类》卷八十说自己对郑樵的说法，“始亦疑之，后来仔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足信”。“盖所谓序者，颇多儒之误，不解诗人本意处极多”。

郑、朱的意见，虽不能全部相信，但它确实为后人研究《诗》三百篇，扫除了障碍，解脱了束缚。崔述《读风偶识》发挥郑、朱之说，考辨真伪，认为序无大小之分，皆出一人之手，但此人是谁，崔氏也很茫然。无怪于这位老先生叹息道：“嗟夫！古人已往，不能起九京以自明，一任后人欲属之谁即属之谁耳！”（《崔东壁遗书》）

《难经》的作者

《难经》一书，又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八十一问》、《八十一难》等等。关于这本书的性质，清代名医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卷下《难经论》中说：“《难经》非经也，以经文之难解者，设为问难以明之，故曰《难经》。”可见，此书是一部解释《黄帝内经》的著作。《难经》全书共有八十一章，以问答解疑的形式，讨论了《黄帝内经》中关于脉法、经络、脏腑、疾病、腧穴、针法等方面的81个带有疑义的问题，其中一至二十二难为脉学，二十三至二十九难为经络，三十至四十七难为脏腑，四十八至六十一难为疾病，六十二至六十八难为腧穴，六十九至八十一难为针法。

《难经》在中医理论的各方面，都对《黄帝内经》有所补充，有所发展。书中内容简要、辨析透彻，尤其

对中医脉学有非常精当的论述，特别是第一难中论述了脉诊“独取寸口”的方法，一千多年来，一直为后代医家所沿用。宋代苏轼在《楞伽经跋》中曰：“医之有《难经》，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后世达者，神而明之，如盘走珠，如珠走盘，无不可者”，对此书评价甚高。由此可见，《难经》不失为我国古代医学的一部重要经典著作。

查考《难经》一书，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和《汉书·艺文志》中均无著录。东汉时期的名医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以及后来的《隋书·经籍志》中，虽然提到了此书，但都没有说明作者和成书时间，因此，历代学者对此书的成书时间和作者，各持一说，自成一言，而终无定论。

晋代医学家皇甫谧《帝王世纪》曰：“黄帝命雷公岐伯，论经脉，旁通问难八十一，为《难经》”。认为是黄帝时代的著作。

唐代的杨玄操，在所著《难经集注·序》中，首次提出《难经》一书为秦越人所著，其曰：“按黄帝有《内经》二帙，帙各九卷，而其义幽赜，殆难穷览，越人乃采摘英华，抄撮精要，二部经内凡八十一章，勒成卷轴，伸演其道，探微索隐，传示后昆，名为《八十一难经》”。随后，《旧唐书·经籍志》等书也记载有“《黄帝八十一难经》十卷，秦越人撰”云云。

但是，也有其他的不同见解，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〇三，《难经本义》条曰：“《难经》八十一篇，《汉书·艺文志》不载，隋唐志始载……吴太医令吕广尝注之，则其文当出三国前。”日本学者丹波元胤在《医籍考》卷七中亦云：《难经》一书“较之于《素问》、《灵枢》，其语气稍弱，似出于东都（东汉定都洛阳）以后之人，

而其所记，又有与当时之语相类者，若元气之称，始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扬雄《解嘲》”。他们都认为是东汉时期的著作。

清代学者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一书中，近代学者廖平在《难经释补证》中，又都断定《难经》一书为六朝时期人所伪托。

《难经》的作者和该书的成书时间一样，也是当代学术界长期争论，众说纷纭的一个问题。甄志亚主编的《中国医学史》认为：从此书的内容来看，《难经》的成书年代似可以确定在东汉以前，大约编撰于西汉时期。至于该书的作者，尚待进一步研究考证，而秦越人所著之说殆不可信。

李今庸在《读古医书随笔》中提出：《难经》一书，旧题为秦越人所撰，此乃系唐、宋间人所为，实非战国时代的秦越人所著。他认为，此书的成书时间不可能早于战国后期，甚至不可能早于秦汉时代，而应当在东汉时期，确切地说，上限只能在公元 79 年（即章帝建初四年）以后，下限很可能在公元 106 年（即殇帝延平）前后。

程鸿儒在《漫谈秦越人与“难经”》一文中认为：《难经》一书是秦越人所著。杨文儒、李宝华在《中国历代名医评介》一书中，也持同一观点。其主要理由是：首先，东汉名医张仲景在写《伤寒杂病论·序》时已经谈到有关秦越人的事迹，“余每览越人人虢，望齐侯之色”。同时也提到了他的《伤寒杂病论》一书“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而成。其次，今本《金匱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中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师曰：夫治夫病者，见肝之病，

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这段回答正是引用了《八十一难》中第七十七难的经文，虽然字句略异，而意义相同。这说明早在东汉之前，《难经》已经存在并且流传了。最后，宋代李昭所编《文苑英华》中载有王勃所写《黄帝八十一难经·序》，其中曰：“《黄帝八十一难经》，是医经之秘录也。……医和历六师以授秦越人，越人始定立章句。”王勃为初唐文学大家，被尊称“四杰”之一，其所言决非无稽之谈。

《难经》的作者究竟是谁？其成书年代到底是在何时？这千古之谜，还有待我们后人去揭开。

萧何制定《九章律》

西汉的法典《九章律》，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上承战国时期魏国李悝所制的《法经》，下启魏晋各朝诸律，为后世王朝所参照，成为中国封建法制制度的一块奠基石。

那么，《九章律》是谁制定的呢？

传统的说法是西汉开国功臣萧何所制定。此说最早见于西汉末年扬雄的《解嘲篇》：“甫刑靡敝，秦法酷烈，圣汉权制而萧何造律，宜也。”并认为萧何所以受封立侯，是因为制律有功。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刑法志》中肯定了扬雄之言，曰：“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摭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班氏之语几乎起了一锤定音的作用，继起的魏晋各朝均承袭其说，以为萧何所作，如西晋武帝曾下诏书说：“昔萧何以定律受封，叔孙通制仪为奉常。”唐朝初年，由太宗李世民亲